

# 中非民间交往：进展及面临的挑战

赵明昊

**【内容提要】**随着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的不断深化，中非民间交往在双方“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突出，中国政府和社会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中非民间交往取得显著进展。当前中非民间交往的制约性因素包括：中国对非关系“行为体”不断增多，“角色”日益多元，中国公民社会仍在成长之中；非洲公民社会对华认知存在偏差，且易为国内政治和西方势力所左右；西方势力对中非民间交往的消极影响。为进一步推进中非民间交往，应准确把握非洲民众对华认知，改善中非关系在“传播”领域中的不对称性；避免中非经贸问题“政治化”，增强在非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法律规范和环境生态意识；加强中非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对话以及“民生导向”合作；中非民间交往应在南南伙伴合作关系框架下展开并对“第三方”保持开放。

**【关键词】**中非合作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民间交往

**【作者简介】**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2006年11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中非将致力于构建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标志着中非关系更趋成熟和稳定，并进入全面拓展和提升的新时期。

①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主张继续加强高层交往、推进互利合作的同时，特

---

① 刘鸿武：“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曾强：“深化中非新型伙伴关系的思考”，《亚非纵横》，2009年第5期；Chris Alden and Christopher R. Hughes, “Harmony and Discord in China’s Africa Strategy: Some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Policy,”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2009.

别强调加强人文对话，促进人民之间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联系，从中非友好大局和双方长远利益出发，妥善处理合作中出现的新课题、新挑战等。换言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更为重视中非关系的民意基础、民众基础和民间交往。随着中非经贸、政治、安全合作的不断深化，中非关系中的民间交往因素日益突出，交往主体和“角色”愈发多元化，交往范围和领域愈发宽广。为进一步深化中非合作，推动“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面建立，需对中非民间交往的政策、实践与挑战等进行探析。

## 一、“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与中非民间交往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6年中非正式提出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后，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中非民间交往，中国领导人多次就加强中非民间交往作出重要表态，日益关注如何使中非双赢合作在惠及非洲国家政府的同时更多惠及非洲普通民众。

值得指出的是，首先，中国方面对中非民间交往的日益重视与中国国内政策议程设置存在密切联系，如中国政府相继提出并大力推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政策。其次，对中非民间交往的重视与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重大关切存在密切联系，例如中国努力推动构建“和谐世界”，并将“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设定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取向。<sup>①</sup>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政府对中非民间交往的重视实际上是其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结果，虽与传统意义上的中非民间友好关系具有微妙差别，但却为中非民间交往积极、稳定、持续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当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囿于自身经济发展受到冲击将放缓对非援助与合作时，中国再次用实践证明自己仍是非洲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伙伴，并进一步凸显了其非政策的“以民为本”特征。<sup>②</sup>2009年2月，

---

<sup>①</sup> Bonnie S. Glaser and Benjamin Dooley, “China’s 11th Ambassadorial Conference Signal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Foreign Policy,”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Vol. 9, Issue 22, November 4, 2009.

<sup>②</sup> 莎拉·雷纳：“努力实现双赢：2009年中非关系回顾”，《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0》，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10-114页。

胡锦涛主席对马里、塞内加尔等四个非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展开友好访问，并提出“巩固中非传统友好政治基础；扩大交流，深化中非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等建议，还特别号召在非中资公司各尽其力，“承担更多责任，与当地社区建立友好关系”。国际舆论敏感地捕捉到了中国领导人此访的“言下之意”，如英国广播公司分析称，此访显示中国希望“在全球经济衰退导致非洲获得资助和投资减少的情况下，以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示人”。<sup>①</sup>

同年11月，以“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谋求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进一步加强中非务实合作的八项新举措，其中与中非民间交往联系较为紧密的包括深化医疗卫生合作、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合作、扩大人文交流等。<sup>②</sup>对此，一些此前对中国在非活动多持“批评”观点的西方和非洲学者都予以积极评价。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项目主任艾利克斯·怀恩斯认为，中国承诺将大力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分配方面并未以对象国资源能源的多寡作为决定性标准，这体现了中国对“民众福祉”（people's well-being）的关注。知名非洲非政府组织“非洲社会公义网络”（Fahamu）研究主任萨努沙·奈度认为，此次会议表明中国已认识到中非关系中公民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也意识到真正的中非“双赢”关系必须以民为本（people-centered）。<sup>③</sup>

众所周知，近年来非洲公民社会对“中国在非存在”（China's presence in Africa）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特别是对部分在非中资企业的不当、不良行为表示不满。对此，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次在出访非洲期间与中资企业进行座谈，希望和要求它们注重承担社会责任，保护非洲劳工权益，提升环保意识等。<sup>④</sup>2007年2月，胡锦涛在访问纳米比亚期间向在非中资企

<sup>①</sup> China Seeks Broader African Role, BBC News, Feb12, 2009,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7885045.stm>; “海外媒体：胡锦涛为中非关系发展定调”，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18/content\\_10839688.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18/content_10839688.htm)，2010年4月12日登录。

<sup>②</sup> “温家宝提出八项举措推进中非合作”，新华网，2009年11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08/content\\_12411492.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08/content_12411492.htm)，2010年4月3日登录。

<sup>③</sup> Stephen Marks, “Nairobi Workshop Gives Civil Society Dimension on FOCAC,” December 10 2009, [http://www.pambazuka.org/en/category/africa\\_china/60908](http://www.pambazuka.org/en/category/africa_china/60908).

<sup>④</sup> 关于目前在非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参见詹世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非共同发展——‘中国在非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调研组考察报告”，《西亚北非》，2008

业强调，“当前非洲国家都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第一要务的位置。经济合作对中非关系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将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我们要努力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增强互利合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不断让非洲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还希望这些企业“要从中非合作的长远发展出发，积极与当地社会和谐相处。特别是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促进就业、改善生活条件、兴建公益项目、培养建设人才、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多为当地排忧解难，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多做深得民心的好事实事，扩大中国企业在非洲社会特别是广大非洲民众中的积极影响”。<sup>①</sup>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多个相关部门相继制定并出台多项规定，加大对在非中资企业的引导和监管力度，通过法律法规和资助“杠杆”，努力消除中非民间交往中的消极因素。<sup>②</sup>这其中，既有敦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的规定，如2005年9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发布的《关于加强境外中资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也有涉及企业加大环保投入的要求，如2007年8月国家林业局发布的《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森林培育指南》。针对受争议较多的“央企”，国资委于2008年1月制定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强调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针对中国境外投资日益增多的现实，商务部于2009年3月出台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敦促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完全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此外，成立于2007年6月的“中非发展基金”明确宣布将逐步制定投资项目的社会和环境评估要求，敦促海外中资企业积极履行环境与社会责任。<sup>③</sup>

其次，中非民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一方面，在医疗援助、教育培训、文化交流等传统领域的民间交往蓬勃发展，如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与多个非洲国家红十字会展开合作，组织非洲国家相关人员到中国进行社区服务、灾害管理、能力建设等专题学习和考察活动，中国对非人道主义援助的针对性

---

年第7期。

<sup>①</sup> “胡锦涛向驻非洲中资企业提出三点希望”，中国青年网，2007年2月7日，[http://www.youth.cn/zqw/xw/szxw/200702/t20070207\\_516624.htm](http://www.youth.cn/zqw/xw/szxw/200702/t20070207_516624.htm)，2010年3月26日登录。

<sup>②</sup> “深化务实合作，全面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陈德铭部长纵论中非经贸合作”，《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3期。

<sup>③</sup> 有关“中非发展基金”的介绍参见 <http://www.cadfund.com/cn/Column.asp?ColumnId=48>。

和实效性进一步增强。<sup>①</sup>另一方面，中国民间组织开展对非工作的积极性、自主性、创新性日益凸显，例如，由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发起成立的“中非民间商会”于2005年3月成立，以“文化先行、义利兼顾”为理念，与联合国开发规划署展开合作，致力于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中国在非民营企业更好地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帮助非洲企业在华开展商业项目。<sup>②</sup>此外，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自2005年至今已向非洲派遣近300名志愿者，参与非洲国家的医疗卫生、农业开发、教育培训、建筑工程、环保节能等建设事业。

再者，中非民间交往的双向性、对等性显著增强。当前，中外学者普遍感到，中非关系正经历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非洲在中非关系中的“能动性”（agency）正不断提升，这将有利于中非双方民间人士进一步提升各自“本土知识”在构建积极、稳定、可持续的中非关系中的作用，从而促进中非民间交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向”（two-way）交流。<sup>③</sup>2007年5月，非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在上海举行，部分非洲非政府组织代表受邀与会，并就中国对非投资和援助问题展开讨论，开创了中国政府主动与非洲非政府组织接触的先河。<sup>④</sup>当月，非政府组织“中国发展简报”、“非洲社会公义网络”、“全球南方焦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也在上海共同主办了中非非政府组织直接对话会议，这是双方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直接接触、真诚探讨、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的重要尝试。<sup>⑤</sup>

2008年4月，第二次中非公民社会对话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此次会议聚焦下列五大问题领域：中非相互认知，中国在非贸易和投资及其经济，

---

<sup>①</sup> “中国红十字会在民间外交中发挥的人道作用”，  
<http://redcross.wuxi.gov.cn/xxjl/500281.shtml>, 2010年2月15日登录。

<sup>②</sup> “中非商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联合国新闻网，  
<http://www.un.org/chinese/av/radio/transcript/china050401.htm>, 2010年3月8日登录。

<sup>③</sup> Aleksandra Gadzala and Marek Hanusch,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Africa: Gauging Popular Perceptions and Thei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Afrobarometer Working Paper No.117*, January 2010; 刘鸿武等：“基于本土知识的非洲发展战略选择”，《西亚非洲》，2008年第2期。

<sup>④</sup> 罗建波：“非洲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第13页。

<sup>⑤</sup> 关于此次会议情况的介绍参见 <http://www.africa.upenn.edu/afrfocus/afrfocus081007.html>, 2010年3月27日登录。

环境影响,中国援助政策,贸易、劳工和移民问题,中非公民社会的作用。<sup>①</sup>有意思的是,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张明(现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在出席该会并致辞时特别提出建议,希望会议主题“中国在非洲:机遇和挑战”能够改为“中国与非洲:机遇和挑战”,<sup>②</sup>一字之差,意涵深远。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影响中非民间组织之间的持续对话。2009年7月,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秘书处、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了中非非政府组织交流活动,就非政府组织交流合作、促进中非关系等议题进行探讨。同年12月,“非洲社会公义网络”在内罗毕召开研讨会对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内容和成果进行评析,围绕双方公民社会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展开交流。<sup>③</sup>

而中非法律界人士之间的互动则体现了中非民间交往专业、互惠、务实的发展趋向。2009年12月,来自中国和20个非洲国家的大约100名律师参加了旨在加强双方法律事务合作的首届“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与会者探讨了法律在中非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各国法律制度对中非贸易投资关系的影响、中非贸易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中方代表还就加强中非法学法律界务实合作提出三点建议:努力将论坛建设成为中非法律交流合作的长效平台和中非关系发展的法律智库;逐步建立中非法学法律研究和培训中心,开展对非洲青年法律人才的培训项目;积极寻求论坛和其他国际法学法律组织开展交流合作。<sup>④</sup>

虽然中非民间交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其与中非关系尤其是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对非外交的整体发展态势以及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总体要求还不相称。<sup>⑤</sup>诚如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官员所言:“虽然中非合作论坛对中非民间交流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但双方人民

---

<sup>①</sup> 关于此次会议的内容摘要参见“China-African Civil Society Dialogue, April 21-22, 2008,” [http://www.boell.or.ke/downloads/China-AfricanCivilSocietyDialogue\\_-\\_Proceedings.pdf](http://www.boell.or.ke/downloads/China-AfricanCivilSocietyDialogue_-_Proceedings.pdf), 2010年3月18日登录。

<sup>②</sup> 张明大使讲话稿参见中国驻肯尼亚使馆网站, <http://ke.china-embassy.org/eng/xw/t429480.htm>, 2010年4月3日登录。

<sup>③</sup> <http://www.boell.or.ke/web/index-143.html>。

<sup>④</sup> “首届中非论坛-法律论坛在开罗召开”,中国广播网,2009年12月21日, [http://www.cnr.cn/gundong/200912/t20091221\\_505784962.html](http://www.cnr.cn/gundong/200912/t20091221_505784962.html), 2010年3月26日登录。

<sup>⑤</sup> 王学军:“非洲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第60-61页。

之间的了解仍然不足，误解仍然存在，双方在交流方面还存在很大空间”。<sup>①</sup>而非洲方面对于加强中非民间交往的意愿和要求亦极为强烈。例如，尼日利亚人权律师、法律与社会行动中心（Centre for Law and Social Action, Lagos）执行主任努比西·奥贝拉认为，“目前非洲人需要理解中国及其对非交往动机，而且这种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sup>②</sup>还有其他非洲学者明确了中非民间交往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取向和努力方向，如“非洲债务与发展论坛网络”（Afrodada）执行主任查尔斯·穆塔萨认为，民众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中非关系的更好转型，中非应重视彼此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这有利于寻求中非合作的最好方式，同时削弱和消除合作中的不利因素，特别是避免中非合作中再次出现非洲与IMF等国际机构以往关系中出现的問題；<sup>③</sup>内罗毕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卡拉布·瑞格呼吁，中非之间的民间交流应当是双向的，非洲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非洲民众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在非洲的角色。<sup>④</sup>

## 二、中非民间交往面临的挑战

毋庸置疑，加强中非民间交往对夯实中非关系的民意基础和民众基础、促进双方关系实现“平等、互利、理性、务实”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思考如何推进中非民间交往之前，需要清醒认识和辨析制约中非民间交往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一）中国对非关系中的“行为体”日益增多，“角色”更为多元，中国公民社会仍处于成长之中。西方和非洲部分人士在看待中非关系时，常将“中国”视为铁板一块的单一分析单元，而忽略了中国对非关系中“行为体”日益

<sup>①</sup> “中非非政府组织研讨会呼吁加强民间交流消除误解”，搜狐新闻，2009年10月20日，<http://news.sohu.com/20091020/n267539798.shtml>，2010年3月28日登录。

<sup>②</sup> Ndubisi Obiorah, “Rise and Rights in China-Africa Relations,” *SAIS Working Papers in African Studies*, March 2008, p.10.

<sup>③</sup> Hakima Abbas, “African and Chinese CSOs Discuss China in Africa,” May 31 2007, <http://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41746>, 2010年2月26日登录。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强加给非洲的“结构改革”的方案与效果，参见舒运国：《失败的改革——20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sup>④</sup> Stephen Marks, “Nairobi Workshop Gives Civil Society Dimension on FOCAC,” December 10 2009, [http://pambazuka.org/en/category/africa\\_china/60908](http://pambazuka.org/en/category/africa_china/60908).

增多，“角色”更为多元的现实。这些“行为体”既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也包括在非洲从事小本生意的中国商人，以及移民非洲的个人或家庭。对于这些“个体力量”，中国政府很难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能够进行有效的“操纵管控”或“公司治理”。<sup>①</sup>这种多元变化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中非民间交往的主体增多，驱动力不断增强，而常常出现的负面影响则是少数在非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缺失和部分在非中国人的行为失范，常常被外界有意无意地置换为、解读为“中国的错误”，从而在“反华”（Anti-China）和“反中国人”（Anti-Chinese）之间模糊了应有的界限。需要阐明的是，对部分中国“行为体”的批评不应等同于对中国的反对。

与此同时，中国公民社会仍处于成长阶段，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在价值取向、关注重点、行为方式、工作文化等方面与非洲公民社会组织存在一定差异，这成为双方进行交往与合作的重要障碍。<sup>②</sup>一方面，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在资金财力、能力经验等方面还较为有限，其关注重点主要是国内社会、经济、教育领域事务，对非洲等境外事务的参与较少。另一方面，中国和非洲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在工作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如前者多倾向采取与政府机构、企业等进行协商合作的态度，而后者则经常使用“指名道姓的批评”（naming and shaming）等较为激烈的方式。当然，应该看到，中非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两者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动力，从而成为中非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合作互利精神的又一有力诠释。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或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不断提升，其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更为积极的变化。如汶川地震发生后，许多志愿服务组织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国务院后来颁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也明确提出，重建应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恢复重建工作。2009年，世界知名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与国务院扶贫办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成

---

<sup>①</sup> 伊恩·泰勒：“中国与非洲：解读两个古老大陆的新关系”，《中国报道》，2009年第4期，第68-69页。

<sup>②</sup> Bates Gill, Stephen Morrison and Xiaoqing Lu, “China’s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ISS Report*, November 2007; Zhang Ye, “China’s Emerging Civil Society,” Brookings Institute, June 2003;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61, 2000.



为国务院扶贫系统认定的第一家从事四川灾后重建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二）非洲公民社会组织对华认知存在偏差，且易受本国政治和西方势力的左右。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西方在非主导和推行的“结构性改革”的可靠合作伙伴，非洲公民社会组织在数量和本土化方面都出现迅猛发展。<sup>①</sup>“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容忽视，它们业已与现代国家政府、传统部族势力构成了一种权力分享的态势。”<sup>②</sup>近年来，很多非洲非政府组织对中非关系给予关注和期待，当然其中也有批评与责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认为中国对非政策特别是“无条件援助”方式忽视民主、人权问题，破坏非洲“良治”努力；中非经贸关系是一种剥削性的、不平等的“南北经济关系”模式，“以资源换制成品”的贸易有损非洲出口结构优化的努力；中国对非援助导致非洲自身能力建设滞后，对华依赖性增强，呈现南北关系中“捐助者-获益者”的权力结构不良趋向；中国企业忽视社会责任、劳工权益，不注重改善工作条件，也不尊重当地劳工的工作伦理（如不愿“吃苦”）和文化偏好，歧视非洲劳工，大量雇佣中国劳工，从而影响当地民众的就业；中国在非经济活动破坏非洲环境等。<sup>③</sup>

总的来看，这些“炮轰”某种程度上是中非关系发展所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的突出反映，但大多偏激表态是对中国对非政策缺乏真正了解、对中非关系发展存在认知偏见和成见以及受国内政治因素和西方势力影响与操弄的结果。

首先，误解的产生源自缺乏机制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比如，中国援建苏丹麦洛维大坝项目曾受到广泛“批评”，一些个人和组织指责该项目导致数千当地普通民众的迁置（displacement），但一直作为受影响民众代言者的苏丹平克伊研究所（Piankhi Insitute）负责人阿里·埃斯库则指出，当地民众并非完全反对建设麦洛维大坝，而只是希望能通过某种渠道将自己的声音呈现出

---

<sup>①</sup>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s between African NGOs and External Partners,” Background Paper by INTRAC, December 2004; Firoze Manji, “The Missionary Position: NGO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8, Issue 3, 2002.

<sup>②</sup> 王学军：“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第57页。

<sup>③</sup> Firoze Manji & Stephen Mark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Cape Town: Fahamu, 2007; 韦红：“非洲非政府组织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压力及对策思考”，《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7-139页。

来。<sup>①</sup>其次，非洲部分国家的反对派或在野党领导人以并不理性和明智的方式表达“反华”诉求，企图谋取政治利益，从而影响当地公民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对华认知。例如赞比亚反对党“爱国阵线”领导人迈克·萨塔在2006年总统大选中叫嚣要把所有在赞工作的中国工人驱逐出境，还要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赞比亚社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奇莱希·穆伦加则附和道：“我们需要资本，我们需要技术，但我们不需要引进劳动力。”<sup>②</sup>再如所谓中国移民“侵入”非洲和中国商品“泛滥”问题，根据在喀麦隆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结果，虽然中国移民数量近年有所增加，但当此议题成为执政党和反对党政治斗争的“话题”时，这一数字便会被高度夸大；此外，81%受访者欢迎中国商品，认为这些商品不仅减轻了穷人的负担，还使不少当地人做起了小买卖。<sup>③</sup>第三，非洲公民社会组织仍无法摆脱西方势力的左右，正如非洲学者亚兹尼·艾普瑞尔所言，大多数的非洲公民社会组织已成为某些捐助者（国）对外政策的“延伸”（extension）。<sup>④</sup>

对于非洲公民社会对中国在非活动和非正常的指责，除了中国学者作出反驳外，不少西方学者和非洲当地人士也开始进行反思和修正。例如，中非关系问题专家、香港科技大学学者沙伯力认为，非洲对华认知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社会因素所决定，而更多是受到“国内政治话语”（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的影响。加纳阿克拉政策与教育中心发展研究项目主任布莱特·西蒙斯指出，“中国战略家一直谋求使中非伙伴关系更为多元化，中国扩大了与非洲大陆的经济接触，已超越了那种政府间的、以大型项目为中心的关系，但‘非洲用农矿产品获取中国资金’这样的观念至今仍受到追捧”。<sup>⑤</sup>

值得指出的是，非洲公民社会组织的对华认知与非洲民众的整体对华认知不可混为一谈。“皮尤全球态度”（Pew Global Attitudes）项目2007年

---

<sup>①</sup> Hakima Abbas, “African and Chinese CSOs discuss China in Africa,” May 31 2007, <http://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41746>.

<sup>②</sup> 有证据显示，萨塔从邻国马拉维的台湾商人那里获得不少资助，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Africa Links,” *China Quarterly*, 199, September 2009, p.749; “China’s African Embrace Evokes Memories of the Old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8, 2006.

<sup>③</sup>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Africa links”, p733.

<sup>④</sup> Yazini April,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and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December 3 2009, <http://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60701>.

<sup>⑤</sup> “China Juggles its Future in Africa,” *Asia Times online*, April 16 2009.

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除南非以外的其他非洲国家民众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达到或超过 2/3。而近期由沙伯力和严海蓉所作的一项针对非洲多国大学教师和学生的调查显示，基本上所有国家的被调查者对中国公司在本国所从事的大型项目建设工作感到“满意”，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对非政策总体上“（对非）较为有益”。<sup>①</sup>

（三）西方势力对中非民间交往的忧心 and 掣肘。西方舆论对于“中国存在”的反应普遍是一种“忧心话语”（panic discourse），“中国发展简报”认为这种忧心更多是源自“世界范围内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的忧虑”。<sup>②</sup>正如研究中非关系的知名英国学者伊恩·泰勒所言，“不断加深的中非关系受到非洲伙伴欢迎的同时，也招致西方国家的诸多非议。这些非议大多是不公平的，而且建立在中对非双边关系错误理解的基础上。”<sup>③</sup>可以说，对于非洲民众到底如何看待“中国存在”尚缺乏全面、客观的研究，而西方势力对中非民间交往的掣肘恰恰集中体现在其对非洲对华民意的影响上。兼具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身份的尼日利亚人权律师努比西·奥贝拉承认，非洲非政府组织对西方“捐助者”和西方媒体的依赖很深，“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之外，非洲公民社会的行为体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了解。”<sup>④</sup>2009年9月《中国季刊》发表了有关非洲对华民意认知的最新研究，认为西方媒体在非洲具有一种“霸权性存在”，非洲本地媒体的信息源大都是BBC、CNN等西方媒体巨头，非洲精英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对华认知常常受到西方媒体的决定性影响，而且西方媒体常与非洲国内的反对党势力遥相呼应、相互借重。<sup>⑤</sup>

然而，针对西方势力和媒体对中国对非关系的“抹黑”，近来已有不少西方学者通过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有关中国存在非活动的不实观点作出了澄清。例如，长期研究中国对非援助的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布罗伊蒂加姆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中指出，中国对非援助并

<sup>①</sup>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Africa Links”, p740.

<sup>②</sup> Linda Lonqvist, “China’s aid to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Civil Society”, Policy Briefing Paper 17, International NGO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er, 2008.

<sup>③</sup> “中国与非洲：解读两个古老大陆的新关系”，《中国报道》，2009年第4期，第68页。

<sup>④</sup> Ndubisi Obiorah, “Who’s afraid of China in Africa? Towards an African 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China-African Relations”,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Fahumu, 2007, pp.35-56.

<sup>⑤</sup>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Africa Links,” pp748-749.

不像西方媒体渲染的那样滋生腐败，破坏良治，恰恰相反，这种援助给非洲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中国的商业活动也并非全然缺乏对环境生态和社会影响的考虑。<sup>①</sup>

### 三、关于推进中非民间交往的若干思考

推进中非民间交往是一项复杂艰巨而充满挑战的长远任务，鉴于交往主体的多元、交往领域的扩展、交往方式的增多，为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非民间交往，似可考虑：

首先，准确把握非洲民众的对华认知，改善中非关系在“传播”领域中的不对称性。正确认识非洲广大民众对中国、中非关系以及中国在非活动的真正看法是有针对性地发展中非民间交往的必要基础。可以说，西方媒体精心炮制的“中国对非威胁”、“新殖民主义”、“新重商主义”等论调湮没了真实的非洲对华民意，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及非洲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和情感，影响了中非合作的持续、稳步展开。实际上，非洲民众大多对中非关系持积极看法，同时积极看待“中国崛起”，认为中国的发展给非洲带来了难得机遇。<sup>②</sup>要做到准确认识民意，改善对彼此的认知，就必须增强中非媒体在国际传媒领域的话语权，并切实提升其传播水平和能力。同时也需要中非民间组织展开直接的、机制化的、开诚布公的沟通和交流。此外，还有学者注意到，相对于中国媒体对非洲的报道，非洲媒体对中国和中非关系的报道相对较少，且大多“转贩”自西方媒体，以至于在非洲难以听到“中国声音”。<sup>③</sup>这种中非关系在“传播”领域中的不对称性亟待改进。

其次，防止中非经贸问题“政治化”，增强在非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法律规范和环境生态意识；促进企业利益和政府政策、盈利需求与社会责任、短期获利与长远发展相协调。中非出现经贸摩擦是可以理解的，完全可以通过友

---

<sup>①</sup>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sup>②</sup>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Africa Links", p740.

<sup>③</sup> Stephen Marks, "Nairobi Workshop gives civil society dimension on FOCAC," December 10, 2009, [http://pambazuka.org/en/category/africa\\_china/60908](http://pambazuka.org/en/category/africa_china/60908); 丁刚：“非洲听不到‘中国声音’”，《东方早报》，2010年6月2日。

好协商和深化合作加以解决，将经贸问题泛政治化不利于化解矛盾、实现双赢。对于中国来说，要从倡导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内政策背景下审视在非中资企业的问题，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促进中资企业严格遵守当地的劳工、环境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范和国际惯例，积极开展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加大对非投资与援助项目的社会与环境绩效评估。同时，也要注重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鼓励其为东道国发展多作贡献。<sup>①</sup>总之，要促进企业利益和政府政策之间的协调，赢利需求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协调，短期获利和长远发展的协调。从非洲角度来说，正如某些非洲学者所言，不应就中国经济活动与西方相比是好还是坏继续进行无谓争吵，重要的是，要通过两者的良性竞争共同促进在非企业以及非洲企业“责任度”（accountability）的提升，同时能够让“受到影响的社会反过来去影响企业在非洲的行为”。<sup>②</sup>其次，管控外国在非经济活动的“钥匙”应当握在非洲政府以及民众的手中，“能否处理好中非关系，使非洲经济和老百姓都获得实在的利益，关键因素取决于非洲的领导人，‘关照’非洲的利益并不是中国责任”。<sup>③</sup>

最后，促进中非公民社会组织对话的机制化，加强“民生导向”的合作。中非民间交往应在南南伙伴合作关系框架下展开并对“第三方”保持开放态度。长期以来，很多非洲非政府组织在西方构建对非关系、推行对非战略过程中发挥了“伙伴”作用，它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管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和影响力不容忽视。应该说，中国政府和社会已逐渐认识到非洲非政府组织在构建中非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但如何使这一因素更好“嵌入”中非关系，成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强有力支柱还需要很多努力。从中国方面来说，为进一步突出中非关系中的非政府组织因素，一是需要加强对非洲非政府组织背景、价值取向、工作领域和活动方式的研究和理解；二是促进中非非政府组织对话合作的机制化，这种机制化不一定仅是采取“开会”方式，也可以通过共同合作完成社会发展项目等多种方式，如2009年12月，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协会和北京市慈

<sup>①</sup> “深化务实合作，全面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陈德铭部长纵论中非经贸合作”，《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3期。

<sup>②</sup> “China-Africa: Civil Society Meeting,” May 31, 2007, <http://www.africa.upenn.edu/afrfocus/afrfocus081007.html>.

<sup>③</sup> “中国与非洲：解读两个古老大陆的新关系”，第69页。

善协会赴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与津新希望基金会、医务志愿者协会共同开展了预防艾滋病宣传培训活动；三是加大非政府组织人力资源培训和能力建设力度。这一过程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彼此合作坚持“民生导向”原则，本着先易后难、逐步推展的方式进行；二是要充分调动民间资源（尤其是中国），让民间交往的“民间”色彩进一步凸显，促进中非关系呈现“多元协调、分层应对”的良好局面。正如有中国学者所言，“长期以来，民间外交在中国的发展侧重于政府的直接参与和控制，而非制度性的引导和协作。这种做法的背后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外交难以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当然也就谈不上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相互配合与协调。”<sup>①</sup>

从非洲方面来说，“国际非政府组织培训和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在非影响力的增长对于非洲公民社会组织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的参与和活动可对北方捐助者（Northern Donors，即来自发达国家的捐助）构成一种压力，使其给予非洲非政府组织更多自主性，并更注重它们自身能力的发展。非洲非政府组织可以借此增强自身独立性，从而摆脱那种“受捐助者引导的政府对抗者”（donor-led government antagonist）的片面、不利定位。<sup>②</sup>其次，非洲非政府组织应正确认识中国以及中非关系的“真正价值”，珍惜南南合作促进两块大陆共同走向复兴的历史性机遇。正如努比西·奥贝拉所言，非洲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知识分子可以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得到很多启发，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包括公私关系、领导力和本土形成的改革计划），面对中国在非存在的扩展，非洲公民社会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在“不加批评的接受”（uncritical acceptance）和“下意识的反对”（knee-jerk rejectionism）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sup>③</sup>

---

<sup>①</sup> 张胜军：“新世纪中国民间外交研究：问题、理论和意义”，《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

<sup>②</sup> Linda Lonnqvist, “China’s aid to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civil society”, Policy Briefing Paper 17, International NGO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er, 2008, pp8-10.

<sup>③</sup> Ndubisi Obiorah, “Rise and Rights in China-Africa Relations,” SAIS working papers in African Studies, March 2008, p 10.

## **China's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People-to-people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ZHAO Minghao**

*Strengthening People-to-people links has been attached much more emphasis by China since “new type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was proposed in 2006. This tre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policy reorientation of China and the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that is continuously shifting with changing Chinese priorities and increasing African agency in the partnership. However, the explos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actors in Africa, the misperception of African civil society towards China, and the vilification of China by the West pose main challenge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people-to-people links.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include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and systemic monitoring of the perception of China by the ordinary African people,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legal compliance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alogues between the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from China and Africa, and the inclus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third sides in the China-Africa people-to-people engagement.*

##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Northeast Asian Three Countries and the Supply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 Tak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s Background**

**WANG Shuang**

*After the Asia Financial Crisis, the East Asian intergration process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slowed down for a whil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at the ASEAN which is in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process is not able to provide essential regional public goods and vitaliz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either from the ability or from the will. Under the tremendous shock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eir close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ld play a role in providing regional public goods and become the new impetu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explain the new economic progresses of PRC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und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ossibility and importance that the three countries can provide regional public goods through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fields*